

yizhong  
bainian  
100

一中百

— 1906 —

2006 —

100

主编 ▶ 潘振远 赵福菴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yizhong  
bainian

一中百

—1906—

100

2006

主编 ▶ 潘振远 赵福菴

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中百年/濮振远,赵福菴主编. —贵阳:贵州教育出版社,2006. 9

ISBN 7—80650—724—8

I. —… II. ①濮…②赵… III. 贵阳一中—校史  
IV. G639.287.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1830 号

---

**一中百年**

濮振远 赵福菴 主编

---

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

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(邮编 550004)

印 刷 贵州捷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字数 18.25 印张 20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 ISBN7—80650—724—8/G·411 定价:18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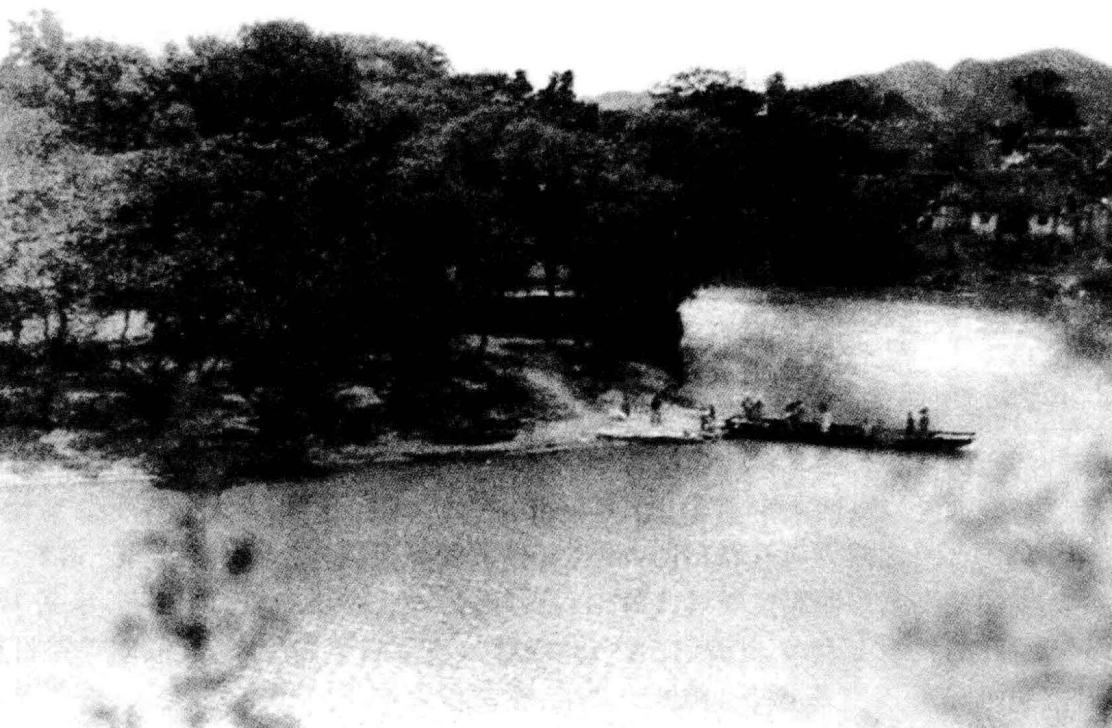
厂址:贵阳市黄山冲 2 号 电话:6791877 邮编:550018

yizhon  
bainia

一中百

—1906—

2006—



有人说：历史，要真情回味才能永恒；现实，要坦然面对才能深刻；未来，要激情描绘才能辉煌；赞歌，要用信念吟唱才能响彻。今天，我们谨以此书的出版为贵阳一中百年华诞祝福！

在贵州，几乎没有人不知晓贵阳一中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，她几乎就是优质高中教育的代名词。1906年，一束火光闪烁在三面环水的两江口，触发这束火光的火花源于礼部尚书李端棻先生的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源于他和有识之士于德楷、唐尔镛、任可澄、华之鸿的远见卓识，使贵州通省公立中学诞生，并由此拉开贵阳一中办学的历史画卷；贵阳一中的校训是“勤慎朴实，自强不息”，倡导人们勤奋学习，慎密思考，实事求是，追求真理，它蕴含着丰厚的中国历史文化。一中历来都不乏出类拔萃的教师，它倡导以学生为主体，充分激活其学习潜力，使教师的教学效率得到极大地提高……这正是一所学校成名奥秘之所在。

《一中百年》以时间为纬，以硕果为经，去述说一个学校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无名到有名的历史沿革；说它的包容，由5所学校合并而成，不是简单的相加，而是5校的扬弃，是各校校风、教风、学风的继承和发展。说它的校长，100年的发展，校长更迭62任，加上副职、书记、副书记已近百人（尚不包括贵阳一中前身学校的副职），这是极为罕见的，主要是抗战时期社会的动乱造成的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不论任职时间的长短，不论办学条件的好坏，都在认真地履行教育教学管理的天职。他们多是些名人、专家，甚至是大家，其治学方法、治学理念，深深地镌刻在百年校史中。说教师，100年来贵阳一中始终都有一支敬业的名师队伍，这是一所学校经久不衰、不断辉煌的根本保证。早在清末时期，那时的“教员”或“教习”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、专家、名人，留学回国的“海归”，乃至高薪聘请的外教。建国后依然有一支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园丁队伍，他们严谨治学，呕心沥血，不仅有高尚的职业道德，而且具有精益求精的教学方法，他们一代接着一代，他们如蜡烛燃烧，照亮学子征程、如春蚕吐丝，织出教育史册上美丽的画卷。说其历史渊源，讲其文化内涵，力求深刻地揭示一所学校成为名校的文化底蕴，这是悠久的中

华民族文化对现代学校的熏陶。说学子，从这里走出4名两院院士、一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，一批党政领导干部、博士生导师、卓有贡献的科学家、专家学者、艺术家、医学家、模范教师、优秀军人、优秀企业家……是一中给他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，给予他们航行的“船”，他们才得以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；给予他们一双“红舞鞋”，他们才在缤纷的舞台上演出如此深动的活剧来。

《一中百年》写了20万字，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穷尽一所名校的百年硕果，唯有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校长、令人敬仰的教师、出类拔萃的学子、独有特色的校园文化、令人难忘的往事、校友怀念母校的深情话语……窥豹一斑，我们依然能看到学校的全貌。书中还有一串串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和百分比率，有一个又一个“第一”，这些数字的后面，体现的是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关心、重视；反映了社会对学校的关注、支持；凝结着学校师生的智慧和汗滴。这些数字反映的是一个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，是一所学校走过100年的生命轨迹，是其扬帆百载的一个里程碑。宋代李觏在《广潜书》中说：“善之本在教，教之本在师。”美善的根本在于教育，教育的根本在于老师。贵阳一中一百年来成为黔中大地莘莘学子向往的学府，其源不正在于此吗？

《一中百年》的撰写，希望的是引发学子们对母校的深情回忆，希望的是全社会更加尊师重教，希望的是贵阳一中的百尺竿头，希望的是一中办校的经验得到弘扬而不是生搬硬套，希望的是贵阳大地涌现出更多的名校，培养出更多出类拔萃的人才。

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，是人的素质的竞争。我们由衷地祝愿：贵阳的每一个校园都成为一块净土，每一个学子的灵魂都在这里得到“德”的净化；每一个校园都成为知识的摇篮，每一个学子都在这里汲取甘甜的文化乳汁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教育发达之时，就是人才济济之时，就必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腾飞之日！

2006年7月30日

<b>第一篇 镌刻年轮</b>	<b>002</b>
贵阳一中的创始人	002
百年名校历史沿革	010
<b>第二篇 渡船舵手</b>	<b>026</b>
风雨飘摇有我撑船	026
碾平波涛扬帆前行	035
<b>第三篇 蜡炬燃烧</b>	<b>076</b>
为人师表授业解惑	076
弘扬进步以德育人	086
<b>第四篇 春蚕吐丝</b>	<b>092</b>
一代名师久负盛名	092
继往开来芬芳奉献	098
<b>第五篇 校园文化</b>	<b>112</b>
历史传承百年校训	112
校园风物蕴含励志	118
报刊文艺群芳争艳	122
<b>第六篇 岁月风流</b>	<b>130</b>
英雄豪杰血沃筑城	130
风流人物走出彼岸	138

<b>第七篇 春华秋实</b>	<b>152</b>
沃土育出的耕耘者	152
白衣战士驱赶病魔	159
走出摇篮的艺术家	160
专家学者才华横溢	162
出类拔萃的企业家	165
<b>第八篇 往事回眸</b>	<b>186</b>
读书会到业余党校	186
别开生面的运动会	188
一场烈火一次考验	189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	192
<b>第九篇 母校情结</b>	<b>198</b>
怀念话语说给母校	198
我心中的人民教师	212
<b>第十篇 百年纪事</b>	<b>222</b>
清末时期	222
民国时期	225
建国以后	243
<b>编后</b>	<b>282</b>

原书空白页

## 第一篇 diyipian

# 镌刻年轮

参天的大树，年轮镌刻着它的变迁。一中的百年沧桑巨变，流逝的时间为她作证，在这块土地上生活、工作、学习过的人们用心为她书写。

我们说贵阳一中已有100年历史，是从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成立之时（1906年）计算的。而该学堂的前身则是贵阳府中学堂，是清末我市成立最早的中学堂，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校址在正本书院（亦称北书院，即今云岩区公安分局所在地），至今已有104年的历史。

### 贵阳一中的创始人

说到贵阳一中的历史沿革，不能不说中国近代史上提倡新学教育的李端棻（1833~1907年）。李端棻，字苾园，贵州贵阳人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百日维新期间被擢为礼部尚书。百日维新失败后，因支持变法，举荐梁启超、康有为、谭嗣同等维新人才，被迫上折自请惩治而被慈禧以其滥行保荐“大逆不道之徒”、“著即行革职，发配新疆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，以示儆惩”。经一年跋涉，中途因病滞留甘州（今张掖），后得赦回乡里。

李端棻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倡近代学制，传播西方民主平等思想。鉴于甲午中日战争的沉重教训，感悟到传统教育的局限及开办新学之弊端，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日（1896年6月21日），向光绪皇帝上了《请推广学校折》。上折时他是刑部侍郎，这些大政方针本不属份内之事，但他是一位有全局眼光的政治家，他认为“人才之多寡，系国家之强弱”。他尖锐提出，皇帝降诏征求“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”，结果“却数月以来，应者寥寥”，“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，罕有济难瑰玮之才”，其原因何在？“非天之不生才也，教之道未善也”。在阐明人才缺乏其源盖于教育落后之后，他奏请自“京师以及各省、府、州、县皆设学堂”。并提出了近代学制的初步构想：以官书



李端棻

局、大学堂为经，以建藏书楼、创仪器院、开译书局、广立报馆、选派游历者等五事为纬。光绪皇帝采纳了他的纳谏，下诏施行。京师大学堂及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学堂相继成立，这些成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前身，中等教育之先河，初等教育之雏形；建立藏书楼等主张则成为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；派遣游历者，则成为其后外派留学生的发端。梁启超在《清光绪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》中写到：“戊戌七月授礼部尚书，未逾月而遭成之命下。”李端棻实际任礼部尚书仅18天，然而他的功绩是难以估量的。梁启超在《新政诏书跋》中说“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”，就是指的李端棻；康有为赞誉说他“抗疏维新冠九卿”，这些是一点也不为过的。

正是这样一位新学教育的倡导者，他对家乡贵阳的教育也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李端棻以年老多病被赦回到贵阳，时已69岁。翌年，受贵州巡抚之聘主讲贵州经世学堂，他在教学中不忘推行新政、培养有识之士、以培根、卢梭学说为题，阐发民权自由思想。他上第一次月课时出题《卢梭论》，学生对卢梭一无所知，一时莫名，他拿出梁启超新编的《新民丛报》，要学生抄阅上面刊登之卢梭传，然后作文，三日交卷。有学生在文中将卢梭比为中国之孔孟，他大加赞赏。为了使读者深入了解他的良苦用心，我们在这里对卢梭作一简单介绍。卢梭（1712～1778年）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著名哲学家，他的小说《爱弥儿》是构思20年和撰写3年于1762年出版的不朽之作。卢梭在书中指出旧教育的失败，同时，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方案。该书分为5卷，其主线索是回归自然，发展天性。文体是夹叙夹议的小说。前4卷指出男子教育的荒谬，提出自然主义的改革方案；第5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。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，直接向严重摧残人心智发展的古典主义教育的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。这是教育领域的启蒙运动。因此他的自然教育理论对后来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这些启蒙思想的精华，对之后的教育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

价值。卢梭的《忏悔录》时隔 200 多年，至今读来，依然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书。李端棻之所以要学生读卢梭，是其推崇新教之心不泯的强烈表现。第二次月课，他又出题《培根论》(培根，英国哲学家，马克思称之为“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”。在教育方面，强调学校应传授百科全书式的知识)。学生又感茫然，他仍以《新民丛报》交学生抄阅后再作。其用心十分良苦，然而他的教育内容和思想却遭到守旧人士的攻击，有人作打油诗进行诽谤：“梁康余党至今多，请尔常将颈子摸；死到临头终不悔，胆将孔孟比卢梭。”“居心只想做奸臣，故把康梁分外亲，此君曾被康梁误，复把康梁再误人。”对这些诽谤，他嗤之以鼻，写下《闻谤自责》一诗，并自撰一联，木刻悬于学堂之内以表心迹：“我犹未免为乡人，甫邀恩命释回，莫补前愆，敢谓藐躬堪表率。师不必贤于弟子，所愿英才崛起，突超先辈，庶几垂老睹文明。”

光绪三十年（1904 年），翰林院学士许泽新等具奏，清廷恢复李端棻原官衔。李端棻为了促进家乡教育的发展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 年）十月，联合四川候补知府于德楷、内阁中书唐尔镛与任可澄、前仁怀直隶厅训导华之鸿等，呈请贵州巡抚林绍年，将原贵阳府中学堂移到次南门外雪涯洞，改名贵阳中学堂。次年（即 1906 年）再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。李端棻提出的创办京师大学堂，即是北京大学的前身。北大百年校庆陈列学校创始人次序时，第一个便是李端棻，第二个才是严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李瑞棻就应是贵阳一中这百年老校的第一创始人。这是他推广学校主张的又一次实践。李端棻晚年丧偶无嗣而感凄怆，然而他却为国事和教育鞠躬尽瘁。晚年他种花栽竹，以梅、菊自喻，有诗《白梅》为证：“坚冰练骨雪为肤，那许尘嚣半点污。纵使玉容消瘦甚，霜花飞上转敷腴。”《雨前》云：“一生爱菊爱清高，未必菊花果姓陶。我爱陶诗兼爱酒，醉余对菊便挥毫。”他逝世前数月还致书梁启超：“昔人称有三岁而翁，有百岁而童，吾年虽七旬，志气尚如少年。天未

死我者，犹将从诸君子之后，有所尽力于国家也。”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11月17日（阴历10月12日）他在贵阳逝世，终年75岁，由继子李葆忠将他葬于贵阳大关口。逝世时他留下遗嘱，将平时积蓄的一千两白银捐给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作办学经费。当我们了解到这段历史时无不为之泪水纵横。

除李端棻外，在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的过程中，还有4个人，是应该在贵阳一中百年校史中垂名的，他们是：

于德楷，贵阳出生，他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变化时期的一名开明士绅，他与其他开明士绅一起带头学习和倡导新学、西学，兴办实业、学堂，成为开风气之先的社会精英，成为向民众传播新思潮的中介者。于德楷幼年丧父，兄弟二人任侠，一个喜驰马击剑，一个好拳勇，他们“不悦学”，则喜武。其母将他送到四川，交由做知县的舅父颜国佐管教，然而这少年帮舅舅带兵有术，受到时任锦州知州的唐炯赏识，因屡建战功而保荐县丞。军务之外，以唐炯为师，昼夜苦读，习《四书》，览《资治通鉴》，日积月累，学有所成。战事平息后，留四川襄补石柱同知（据载还做过万县知县）。他以候补知府归里，寓居贵阳正新街，成为乡人周知的“义士”。

他一扫传统绅士“重农轻商”观念，于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与唐炯合资8000两白银，在贵阳正新街开设了“同济堂”药店，除意在解决贵州缺医少药的问题外，还志在开发夜郎地方草药丰富资源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他与李端棻首创贵州铁路矿务总公司，这是贵州近代化历史的重要一步，虽两年后停办，但其收回列强垄断的在华铁路、矿山利权，筹办矿业学堂，倡办民族工业的宗旨，对于强化黔人走近代化之路的意识是大有裨益的。

在兴办实业受挫后，他意识到贵州走近代化之路，不仅需要资金、技术、设备，而且更需要人才，于是着力于育新人、开新风。他回筑后与罗文彬主持修复阳明寺。他热心学习西学、新学，曾向在筑西人借阅各类新书如：格物入门、地学、谈天、



于德楷

勾股、开方、医性等，这些书即为今天的物理、地理、天文、几何、代数、医学等自然科学书籍。他与李端棻等人利用贵州学政严修改革的学古院和资善堂官书局，传播西学（如外语）、新学。后出资修建资善堂，为该堂购置大量书刊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又与乐嘉藻、李裕增等在次南门外雪涯洞丁公祠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，经费由地方筹集，教师多为高薪聘请的日籍教员，所用教材从日本带来，共办了3期。于德楷任总理，负责学堂的筹款和大纲规划，他大胆引进外籍教师和西方现代教育模式。但当1905年日俄战争日方取胜，日籍教员强迫学生“会饮”庆贺时，他支持学生正义行动予以拒绝，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，不惜全部辞退日籍教员，并将交涉笔录寄到《新民丛报》（当时在日本刊发），将事件真相公诸于世。公立师范关闭后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他与李端棻等人联名呈请设贵阳中学堂，面向全省招生。于德楷与唐尔镛同为监督，他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理想，还创办了蚕桑学堂（贵州省第一所实业学校）和贵州官立农林学堂（地址油榨街），这些都是贵州最早的职业技术学校。他还从董其坝移来4株梅树为学校增色。晚年他以育梅抒心中郁闷，而梅恰是他性格的象征。

唐尔镛（1863~1917年），字慰慈，贵州遵义人。先考取举人，于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考取内阁中书。他是贵州教育界的先驱，竭力在贵阳兴办教育。曾任贵州军都督府秘书长、教育司长、云南滇中道尹、众议院议员等职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唐尔镛自北京归来，时值贵州巡抚林绍年创办官立师范传习所，经徐天叙推荐，唐任传习所监督。开办三期，学生回县后，成为办学“火种”，纷纷成立地方学堂，使贵州教育面貌大为改观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在传习所基础上，他创建了附属小学堂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十月，他与华之鸿、任可澄在贵阳创办贵阳中学堂，唐尔镛、华之鸿任中学堂监督。在创建过程中，除华之鸿捐银27000多两外，唐尔镛、任可澄运用其在



唐尔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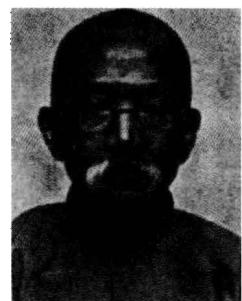
上层社会的关系，得到清政府在职与退职官员以及在外地的贵阳籍官员，如云南矿务大臣唐炯（唐尔镛系其孙辈）、江苏巡抚陈夔龙、云南布政使刘春霖、甘肃按察使陈灿、贵州巡抚兴禄、贵州按察使全懋绩、提学使陈荣昌、按察使松萼的大力资助，使学校财力较为充足，设备良好，并聘有外籍教员，使学校成为贵州省最有影响的新式学堂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唐因办学成效显著，贵州巡抚庞鸿书又委托他和华之鸿在贵阳开办优级师范选科，由他俩任正、副监督。同年，贵州教育总会成立，唐尔镛出任会长。唐尔镛满门桃李，学生遍及全省。通省公立中学、优级师范选科学堂、宪群法政学堂、南明中学，被人们称为“南明四校”，唐尔镛、任可澄、华之鸿被公认为“南明四校”创办人。唐尔镛一生为教育呕心沥血，民国初年他客死北京。他逝世的消息传到贵阳后，其学生数百人闻讯聚于南明中学，泣不成声，私谥唐尔镛为“康定先生”。任可澄挥泪写下感人挽联：“雪涯风雨，几共辛勤，启筚路篮缕，山林有教泽长留，源流请视南明水；冠盖京华，可怜憔悴，寄愁心夜郎，落月恸生归来德，絮酒难招北地魂。”

华之鸿（1871~1934年），字延仪，晚号延厘，贵筑县人，清末民初贵州著名的企业家，祖上以行医来到贵州。至父亲华联辉，方改从医为崇儒习商，办永隆裕盐号、贩运、销售川盐，从而发财致富。

华之鸿幼时随父攻书习字，学做生意。14岁时父亲病故，由叔父教诲，后考取秀才。20岁母亲病逝，辍学撑持家务。不久娶寇氏为妻，专心发展盐业，初露经营理财才华。经数年努力，盐店遍布全省，家产高达百万两银子，成为贵阳首富，人称“华百万”。

华之鸿虽然家产百万，却一生俭朴，平时身着粗布长衣马褂，步履单行。不贩、不吸鸦片，不嫖娼、纳妾，尤恶赌博。他以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”之古训，立身、持家、兴业、



华之鸿

教子，人们称赞他“宅心仁爱，律身端谨，品教学实，德备行优”。然而他在为民济善方面却慷慨解囊。每年端午、中秋、腊月三个季节，上交税银少则数挑、多则数十挑。支持大汉贵州军政府、贵州都督府银子数万两以上。为四川、安徽、贵州赈灾达10余万两。参与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、优级师范选科学堂、宪群法政学堂、团溪两等小学堂、息烽底寨小学堂等，也在10万两银子以上。建义仓、筑桥、办义渡、施舍粮食衣物，少则过百两，多则逾千上万两。此外还出资疏浚修文黄沙河、贵阳朱昌河，以图打通贵阳经乌江直达长江的水上交通。

华之鸿在新思潮的影响下，出任仁怀厅（今赤水市）儒学训导时，办教育、订书报，抓质量，使学子多有仕途之机。他把许多精力用在投资办企业上，以走实业救国之路。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贵阳文通局正式开业，印出的第一部书是西南巨儒郑珍编著的《播雅》；第一份报纸是《贵州公报》；第一种纸币是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面值一角、二角、五角、一元、五元、十元六种彩色黔币，并出版了大量书籍。由于印刷业务的大量增加，他招收了女工，并由日本女子管井乃扶（又名梅子）进行训练。这是贵州省第一次招收女工，增辟了女工谋生之路。当时本地不能生产纸张，影响印刷质量，他筹银5万两，却被省府以借用为名，将数十驮银两扣去。他悲愤之余，重筹巨资派人东渡日本购买机器，在贵阳成立永丰抄纸厂，从而生产出在全国独具一格、质量极优的纸张。从而大益于桑梓。他还投资扩建仁怀“成义”茅台酒厂，改进生产工艺，增加产量，提高质量，在民国4年（1915年）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让茅酒飘香，获金质奖章，使之成为国际名酒。

华之鸿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，跻身于贵州政界和财界。曾任贵州商会会长；与任可澄、唐尔镛等成为贵州宪政党创始人、领导者；先后出任过贵州省政府部长、财政司长和省银行总理等要职。

华之鸿的业绩得到社会公认，他逝世后，平刚等154人，就其持身、居官、资学、交通、实业、纾难、慈善等方面的事迹整理成册，报请省政府转呈民国政府内政部嘉奖。民国24年（1935年）7月4日，国民政府以第3677号训令，签发“殚心公益”匾额、证书，以资褒扬。

华之鸿为资助办学多次慷慨解囊捐赠巨款，仅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的创建捐银达27000多两（据任可澄《华之鸿神道碑》记载则为捐资3万余两），贵阳一中百年发展史当重重地记下这光彩的一笔。

任可澄（1878~1945年），原名文焯，字志清，晚号匏叟，贵州普定县人。18岁由廪生而贡生；25岁乡试中举；次年授内阁中书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受贵州巡抚岑春煊委任为贵州学务所参议，并与唐尔镛等创设师范传习所，培训小学师资。同年十月，与李端棻、唐尔镛、华之鸿等筹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。任可澄继唐、华之后任堂长，并利用其与上层社会的关系，与唐尔镛一起向贵阳籍官员集办学资金，改善了学校设备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与唐尔镛、华之鸿开办优级师范选科于雪涯洞，以培养中学师资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作为贵州宪政党的领导者，控制着《黔报》、《贵州公报》宣传工具，与《西南日报》针锋相对。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经唐继尧任命为临时都督府右参赞，同年4月，被任命为黔东观察使。1913年，被选为贵州参议院议员。1914年2月，任镇远道尹，1915年被任命为云南巡按使，1916年7月，任云南省省长。曾参与护国斗争。1918年回筑。1920年12月，贵州政变，省政府无人署理，众推举他为临时省长。1919年8月，贵州通志局成立，被任命为总纂（主编）。1925年6月任内阁教育总长一年；1936年被派往昆明署理云贵监察使。1938年8月，被推为贵州文献征辑馆馆长。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物。

任可澄为贵州的出版业作出了重大贡献，他主持续修《贵



任可澄